

千萬不要把假的歷史留給後人

——出席成都口述史研討會暨參觀汶川災後重建紀實

胡志偉*

壹、鍾靈毓秀 名垂千古

明末清初歐陽直公在《蜀警錄》中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從貶義來看，是說四川人好亂、難治、刁頑；但以褒義來看，它表明四川人的先亂後治精神頗具建設性的競爭思想。從歷史上看，四川偏處西南一隅，其戰略位置得天獨厚，地勢險阻，糧草充足，易守難攻。因此每當天朝帝國瓦解之時，巴蜀便發生起義或割據，近兩千年湧現過西漢末年公孫述、三國劉備、東晉李特、南北朝蕭紀、唐朝劉闢、五代王建、孟知祥等七個短命王朝；而當天下已定、硝煙散盡之時，這塊窩在山峰裡的盆地卻遲遲未被納入統一的版圖，需要統治者盡最後的努力來收復它。例如，西元1235年，蒙古南侵南宋，到1279年宋室覆亡，戰爭延續了四十四年之久。成吉思汗之孫蒙哥汗率十萬騎兵分三路攻蜀，在合川縣東釣魚城遇到了頑強的抵抗，南宋守將王堅築城於懸崖峭壁，兵精糧足，擊退了蒙軍一次又一次的強攻，蒙哥圍攻不下

負傷死去，隨他出征的不少將領都戰死於這個2.5平方公里的山城。釣魚城頂住了強敵二十年的圍攻，使宋祚得以延續二十年之久，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如今北京的軍事博物館古代戰爭館就陳列了釣魚城古戰場的沙盤模型，把它列為世界百大戰役之一。據元史和明史統計，四川人被蒙古兵屠殺了一千二百多萬。

明末張獻忠屠川與張獻忠同清兵的鏖戰，使四川人口由六百萬銳減至五十萬，僅四川貢生就被殺四萬人。然而，四川人沒有被殺怕，推翻滿清的火種就是從四川點燃的：上世紀初，清廷宣布鐵路國有化，隨即又將路權轉賣給洋人，遂引發四川保路風潮，保路同志會只是和平抗議，清廷卻派兵鎮壓，命渝漢鐵路督辦端方自武昌率新軍入川增援，導致武昌守備空虛，於是辛亥革命一舉成功。中共建政初期，反共游擊隊最活躍的就是在四川省，川南的反共救國軍曾佔領五分之三以上的區、鄉、場鎮，截斷各交通幹線與川江航道，使中

* 香港自由作家。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本文作者宣讀專題報告

共頭疼不已。1950年5月，中統特工龐林率領義軍燒毀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同年軍統少將田棟雲組織川滇黔反共游擊軍，轄十一個縱隊五萬餘官兵，攻克廿二個縣；1952年，川軍楊森部軍長傅秉勳策反兩個共軍師級部隊在川西黑水建立反共突擊軍，毛澤東稱黑水是「小臺灣」；1950年2月，共軍第一七八師政治部主任朱向離在成都近郊龍潭寺為川西人民反共救國軍伏擊身死。中共調動幾十萬大軍到1952年才將四川的反共游擊戰士消滅殆盡。

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武鬥風潮，全國第一聲槍響就是在成都132兵工廠打起來

的。四川武鬥堪稱全國之冠，動用了最先進的武器。

1989年6月4日，戒嚴部隊平息了天安門廣場的和平靜坐後，成都還在放火焚毀人民商場。

四川人民的反抗精神還表現在1993年的仁壽縣農民抗稅大暴動，參加者達一萬五千人，迫使朱鎔基總理大幅度減輕農民負擔。2004年10月18日重慶市萬州區一名房地局局長夫婦毆打一名無辜挑夫，激起四萬民眾包圍區政府大樓，推倒和焚燒多輛警車，當局出動數千防暴警察才驅散人群。同年10月，四川漢源也因為當地政府修建電站淹沒農田剋

扣賠款而引發十幾萬人的大規模騷亂。此後，全國各地越來越亂，群體性事件已從2003年的六萬起增加到2009年的九萬起。近年重慶的士司機大規模罷駛抗議事件與四川近百所中小學教師罷課抗議低工資，都引起了外界的關注。

四川人民對中華民族的最偉大貢獻乃是：抗戰八年中，有340萬川軍出川抗戰，傷亡64.6萬人，約佔全國抗日軍人傷亡總數的20%；四川省擔負了當時國民政府財政支出的30%以上，擔負了40%的軍糧，把自己生產糧食中的32%送上了前線；她接待與安置了中央政府57個機關、內遷企業近700家、內遷高校48所；為了空軍的需要，成都地區以最簡陋的工具和最快的速度趕修了九個飛機場；在抗戰最艱苦的1943年，四川四萬多大中學生和公教人員飛赴緬甸補充遠征軍；在1943年底的節約救國獻金運動中，四川各地人民獻金高達5億元。抗戰八年，四川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假如沒有四川，我們不能想像抗戰是不是會支持如此之久。

貳、巴蜀學者剛腸俠骨威武不屈

從歷史工作者的立場，我對巴蜀同胞的威武不屈、剛腸俠骨，是由衷地欽

佩，所以11月初收到遲來的請柬，即放下手中業務，急忙準備出席由四川省社科院與當代四川史編委會於11月21日至22日在成都舉行的「第三屆全國口述歷史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在成都蜀蘭大酒店舉行，到有一百五十多名專家學者，發表學術論文44篇，有20人在大會發言，50人在小組發言，論文與發言充分表露了四川人的開創性、超前性和風險意識。例如四川省政協前副主席章玉鈞說：「為了留下信史，一些知情人在圍繞『天下未改蜀先改』做口述，即使不發表，也要留下對歷史的集體記憶。一群未成年的成都高中生在1963年社教運動中被判為異類，遭到迫害，並株連親屬，這些花季少年今已年過花甲，他們坦言：為苦難作見證，是希望兒孫記住那些苦難，不要再有那些苦難。普通人的見證，在某種意義上要比名人、大人物的見證更可貴、更難得，也更重要。」

樂山師範學院教授稅海模說：「口述歷史的寫作，需要以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正義、免除貧窮與恐懼、有否人的尊嚴，去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否則，如像當下電視上熱播的宮廷戲似的，從口述歷史中也引出諸如『皇上聖明』『奴才有罪』之類的反向

啟示，則完全只具有負面價值了。」他以邢小群的〈聶元梓訪談〉為成功文本，聶說：「毛澤東看什麼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說明他還有奴才的本質」、「1968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會上說江青是三十年代魯迅一樣的戰士，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啦，等等，他當時為什麼吹捧江青？因為那天毛澤東就在幕後坐著呢！文革期間對所有被揪鬥、被關押的高幹和知名人士，是保護還是關押，他都簽字，那時槍斃了一些青年，也是他簽的字。」他說：「1976年的四五運動，製造了一個『人民總理愛人民』的『當代聖人』神話。聶元梓的口述歷史就有某種將周拉下神壇的解構作用——其實，周不只一次在歷史的緊要關頭，都為自保而更愛自己。」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吳銘能說：「陸鍵東查閱了超過千卷的文革檔案，寫出了521頁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該書524條註解中有205處是來自檔案資料。此書在史學界評價很高，但由於書中提及龍潛（1910-1979，曾任周恩來秘書，1955-56年任中山大學副校長、黨委書記）在中山大學任職時期的行為，引起了龍潛後人不滿而告上法庭，一審作者雖勝，二審卻敗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作者登報道歉與賠

償龍潛後人5千元「精神損失費」，還勒令未刪改之前不得重印與發行。此案的判決引起了「寒蟬效應」，哪家檔案局還膽敢為學者研究而開放檔案呢？」我在發言中也指出，在民主國家，死人是沒有名譽權的，是好是壞，蓋棺論定。倘若死人也有名譽權，秦檜、吳三桂、汪精衛的後人，可以每天都把我們歷史工作者送上法庭！

章玉鈞指出，如今思想文化主管部門對口述史缺乏明確鼓勵的態度，存在議題禁忌，巴金提出的文革博物館等建議得不到批准。口述史涉及某些事件和人物是犯忌的，令人心有「預悸」。有的書愈禁愈暢銷，有的書「出口轉內銷」；也有些知情者怕撞上「高壓線」，三緘其口，謝絕訪談，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三是口述史水準參差不齊，有人炫耀或洗刷自己，甚至藉口述史名義，編造拼湊、兜銷私貨，需要人們鑒別和警惕。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社長周五一對唐德剛的人品與學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既然號稱《張學良口述歷史》，至少應該是出自張學良之口的歷史，整理者不該以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口述者，如整理者認為口述的內容有疑點或差錯，應該用註釋來表明自己的意見，而不應不加說明地加以改變。

唐德剛在《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從語言到內容的過多加工和研究性創造成分，就成了運用「口述史料」的歷史「著述」。唐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序言中自稱此書85%是他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只有15%是張自述，所以人們看不出哪一段是張學良說的，哪一段是唐的意見。如果將口述者的觀點作了改動，這樣的著述就不能以口述者的名義冠名了，所以張學良晚年同唐德剛割席，不讓他進門，也不承認唐的偽作，要另闢蹊徑作口述自傳。他還高度讚揚張之宇、張之丙姐妹歷時三年採訪六十多次錄音145盒，4,600頁抄本的張學良口述歷史，認為張氏姐妹對中國口述歷史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只不過唐德剛生前出於嫉妒，到處誣衊、誹謗張氏姐妹，臺灣的報刊出於無知，一窩蜂地起哄附和，唐德剛死後，臺灣史學界對唐歌功頌德不息，刻意美化了唐，也隱瞞了事實的真相。從這一議題上，我看出中國大陸學者，雖處於資訊相對閉塞的地域，但在追求真理、忠於史實方面，已經遠遠超越臺灣的同行們。

叁、為了和平收藏戰爭 為了 安寧收藏災難

22日下午，與會學者分坐兩輛大巴到成都以西六十多公里的大邑縣安仁鎮，參觀中國最大的民間博物館——建川博物館。該館佔地五百多畝，建築面積1萬5千平方米，已建成中流砥柱、正面戰場、川軍抗戰、抗日戰俘、援華美軍、偽軍醜行、侵華日軍、眾志成城等八個陳列館，看完八個館要步行十公里。因時間所限，我們只看了兩個館。在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抗戰文物陳列館，陳列著國軍抗戰的軍服、一萬多枚勳獎章、當年報刊、烈士遺書以及俘獲日寇的武器、服飾等等。年輕的講解員指著中共官方宣稱八路軍殺敵52萬的告示板說：「整個抗戰，日軍僅陣亡60萬，那個數字顯然是誇大不實的」，在講到平型關戰績時，他說：「以前林彪說殲敵一萬餘人，可是遭八路軍伏擊的日軍輜重部隊總共僅二百多人，在東京靖國神社供奉的平型關戰死者靈牌僅四十多人」，我們聽了大笑。當他指著張靈甫肖像訴說抗日名將自盡孟良崮，指著吉星文說「廬溝橋的吉團長未死於日寇屠刀卻是死於八·二三炮擊金門」，人們的心情十分沉重。在院內一個斜坡上，豎立著二百壯士的鋼鐵塑像，從蔣介石、宋美齡（曾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湯恩伯、何應欽，直到仁安羌之

戰的劉放吾團長，都是依照相片塑造的，仿真度極高。以前臺灣文宣總說：「蔣總統在西南五省（川黔滇粵桂）威望最高」，如今親歷四川才得到證實，而且這種威望已從抗日那一代傳承到第三、四代。

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是中共南下幹部的子弟，岳父還是老紅軍，他本人當過兵、上過大學，畢業後教書，然後從科長做起，官至宜賓市常務副市長，正當省人大要提拔他為市長時，他卻辭職「下海」了。他在商海中打拚了幾年，在上海投資地產賺到很多錢，卻

又決定改行蒐集抗戰文物，十幾年來，投資五億多元，透過國內480人、日本幾十名「線人」組成尋寶網路，買回了800萬件歷史文物（國家文物館僅存有80萬件），其中文革公章就有2萬枚、像章200萬枚，重7.8噸、私人日記兩萬多本、電影拷貝一萬多部、膠木唱片15萬張、文革書信55萬封。像文革時的四開宣傳畫〈毛澤東在天安門〉，十五年前值5元，如今已升值至1千元。800萬件文物包括121件國家一級文物（國寶級），例如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油印命令，當時印200份，現剩下一份，是賀龍



作者與蔣、宋塑像合影

的堂兄、貼身副官保存下的；還有黃炎培用交通銀行信箋書寫的章伯鈞、左舜生等民主黨派負責人要求軍隊國家化的致中共中央函件，是花了幾十萬元買來的；有聶榮臻女婿丁衡高送出的聶帥抗戰時使用的公文包，還有蒙奸德王的蒙文結婚證書；他還花30萬元雇了一個香港記者到臺灣翻拍了陳誠、白崇禧、何應欽等軍政要人的新聞片影像。他耗重金搜羅了中緬邊境的美國飛機殘骸、老布什（因其駕駛戰鬥機曾在太平洋上空被日機擊落差點落入日寇手中）用過的辦公桌、日軍投降時交出的機密公文、宋子文與宋美齡親筆簽署的二十多張支票（其中最大金額357萬美元）以及記載了日寇燒殺姦淫暴行的八大本日記與照片，他還把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一座碉堡切成十幾塊，用卡車奔馳兩千里運到四川安仁鎮，重新安裝在博物館門口，藉以提醒國人勿忘日軍侵華罪惡。

樊建川和他的下屬，都穿著迷彩服，他滔滔不絕向我們講述了建館經過。他說，1985年一部廣西電影製片廠出品的電影《血戰台兒莊》點燃了他收藏抗日文物的激情。影片中的川軍師長王銘章中彈負傷，遍體流血，猶挺身呼叫：「拚上去，中華民國萬歲！」這讓他肅然起敬，於是他開始收集川軍抗日

資料。史料說，抗戰時先後有三百萬的川官兵參戰，但有關這三百萬人命運的記載卻是令人驚詫的空白，內心強烈的震撼迫使他研究川軍抗戰史，並收集抗戰文物，上窮碧落下黃泉，奔走於海內外。我在陳列室中見到他的收藏品有：蔣公贈送廬山受訓軍官的瓷茶壺、七戰區司令長官陸軍二級上將劉湘的紫砂茶壺、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第廿七集團總司令楊森的墨盒、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的抗日詩扇、廿三集團軍副總司令陳萬仞的瓷杯、卅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上將的中國航空建設協會會費收據、第四十一軍軍長王銘章騎姿銅像（被紅衛兵搗毀前攝）、川軍第一四六師師長劉雨亭的特製瓷器以及大量的抗戰書刊，如《戰時畫報》、《抗戰導報》、《新生中國》、《戰事畫刊》、《力行》、《永生》、《生活畫報》、《青年月刊》、《滇西作戰實錄》、《抗戰必讀》、《從九一八到七七》、《抗日將領圖說》、《勝利版畫》等等。

在博物館大院中的中國老兵手印廣場豎立著成排的看板，上面整齊地排列著四千多名抗日官兵的手印，包括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軍分區政委趙紫陽、東江縱隊政委袁庚。他逐一訪問健在的抗日老兵，向他們解釋留下手印的重要

意義，那些人晚境多數淒涼，國軍老兵們在多年勞改後多數是蹬三輪車、拉架子車、開山挖沙，淪為社會的最低層，其中兩千個手印是他到醫院太平間搜集的。他到日本蒐集抗日文物時，曾向日本官員指責日軍殘殺戰俘，日方回答說，自七七事變後，中國政府並未正式向日本宣戰，所以日軍不能遵照日內瓦戰俘公約對待中國俘虜，直至珍珠港事變爆發翌日——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日本才停止殺俘。他找到戰時隨耿晨去北海道花岡做苦工的一位山東老兵，去時才十幾歲，現已八十多歲，見了他嚎啕大哭。還有一位來華助戰的美國空軍飛虎隊機師，一直是獨身，2005年5月雇人推輪椅到大邑來參觀援華美軍館，見到館內陳列大批美軍助華抗戰文物後，痛哭流涕，此人回美國後兩個月去世，遺言把自己全部遺物捐獻給建川博物館。

肆、千萬不要把假的歷史留給後人

樊建川說，當他籌劃建立反右博物館、文革博物館和貪官博物館時，省委宣傳部門立即下令禁止，還不許傳媒報導宣傳，雖然他是中共黨員，卻被列為「內控」——管制分子。年前傅高義

（1967-2000年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主任，能熟練運用中、日文，著有《日本第一》和《共產主義下的廣州》，近年致力於鄧小平及改革開放的研究）上門要求派學者與館方合作研究文革史時，他感到一旦傳出去，馬上會玩完，不過，他認為合作研究知青史還是可以的，現正規劃新建十二個館：紅色年代館，陳列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文物票證，改革開放館陳列後三十年的文物；知識青年插隊落戶館，五七幹校館；文革主題館建築在水上，意味著從此岸走向彼岸；檢查檢討館、土改館、鎮反館（藏有判決書、殺人布告四千多張）；人民公社館（廣東中山現在還有一個人民公社，專門雇用外地民工耕種，每位社員不必勞動，年分十萬元）、三年災荒館。後者難度很大，雖然他收藏了一百噸的舊報紙，但1959-1962年的《人民日報》光是報導「鶯歌燕舞」，毫無饑荒消息，偶爾有些推廣代食品，用玉米芯子磨粉代替糧食的短文。那年頭他父親是個十七級幹部，每日定糧也僅三兩七錢五分。他只蒐集到水腫病的病歷單，居然找不到一張餓斃倒地的屍體照片，現在官方承認三年災荒餓死四千多萬人，還有人說六千萬，但是當年沒一個記者膽敢拍攝餓殍，他

認為：這一代人有責任留下這些悲慘的紀錄。還有漢奸館很難蒐集資料，因為沒人願意承認自己的父親、祖父是漢奸，還有人寫小說拍電影為漢奸親屬塗脂抹粉。至於抄家館、自殺館（藏有大量文革自殺者的遺書）在十五年內是做不成了。另外有個樊建川書法館，作為一個成功的書法家，他已書寫了七百米的長卷。

樊建川的講話在掌聲中結束，四川省社科院前副院長萬本根激動的大聲怒吼道：「我的熱血在沸騰，樊建川對烈士、對國家一片赤子之心，蒼天可見，希望在座每一位都來幫助他，要從精神上幫助他。我們今日在壯士廣場舉行四川當代口述與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就是要建立一個世界級的口述歷史基地，樊館長剛才的報告引起了大家靈魂的震動：千萬不要把假的歷史留給後人！」

最後，四川省政協前副主席、當代四川史編委會主任章玉鈞致研討會閉幕詞。他說，建川博物館試展時，有些頭腦僵化的領導人從中作梗，說「怎麼讓國民黨同共產黨粘在一起了？」於是，「正面戰場」館的招牌被布幕遮住了，直到2006年9月3日，中國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來此地參觀了未揭幕的「正面戰場」館，為館名親筆題字，對此評價極高，上頭才對該館解了凍。樊建川把自己做房地產賺下的錢全投進去了，最近前來參觀的人增多，收入才勉強可以糊口。上頭規定的條條框框很多，他只能繞邊走，不過，路是在腳下的，曲線地走，最終目的一定不變！

23日上午，我們乘車到成都西北一百公里的汶川，沿途見到地震慘況：原來雙行的國道已被泥石流淹沒了一條，滿目瘡痍，遍地亂石，進入眼簾的都是折斷的橋樑與湮沒的樓房，但也有數不清的建築公司安營紮寨從事重建工程。在汶川以南的小鎮綿虜，重建工作在廣東珠海市斥資4.2億援助下，全鎮1,826戶已全部搬入新居，世代居住在高山上的羌族農民亦正分期分批往山下遷移，那每戶三層六大間的樓房附帶陽臺與天臺，造價僅20萬元。當我告訴戶



地震災區慘景



地震災區慘景

主，這樣的樓房如果在香港半山，至少值4千萬元時，他們笑顏逐開，笑得合不攏嘴。綿虎鎮山水如畫，氣勢闊闊，乃是大禹的誕生地。珠海市一名博士副市長，利用歷史遺產與地震產物，立即組織災民採石運石，僅用一百天就修成了類似中山陵的「大禹故里景區」，用石塊砌成415級高的祭壇，壇場有63平方米，上頭豎立著四川美術學院雕塑大

師葉毓山的傑作——16.1米高的大禹雕像。這座宏偉建築既安置了災民生計，又利用資源建成一個大型觀光景區，使我對四川人更增添十二分敬意。珠海市陳副市長率領數十名羌族婦女載歌載舞迎接學者專家到訪，那些羌民，自古匿居高山，一次強力地震使他們因禍得福，還住上了三層洋房，看來，這個國家的凝聚力還是值得稱頌的。如果中共能把抗震抗災的愛心用於流亡海外的千百位民運人士，如果中共能以虔誠的心態平反六十年來歷屆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我想，忘掉仇恨、復興中華民族還有希望的！